

李劫文集

武漢出版社

1

李蕤文集



第一卷·报告文学

武漢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蕤文集/李蕤著. - 武汉:武汉出版社.1997

ISBN 7-5430-1624-9

ISBN 7-5430-1633-8

I.李… II.李… III.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
IV.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8967 号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8968 号

李蕤文集(第 1 卷)

李 蕤 著

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)

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黄冈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8.25 印张 7 插页 字数 35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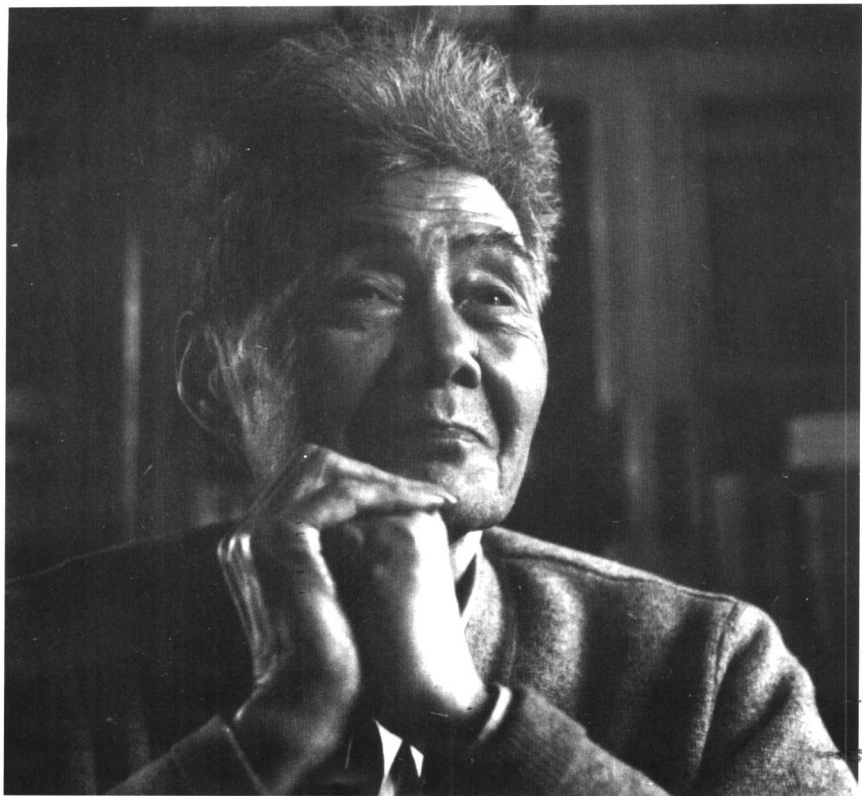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 册(全套共四卷) 定价:(精 装)140.00 元
(简精装)100.00 元

(精 装)ISBN 7-5430-1624-9/I·228

(简精装)ISBN 7-5430-1633-8/I·230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

作者简介

李蕤，原名赵悔深，曾用笔名：流萤、周纳、肖云、赵初等。中共党员。河南荥阳人。1911年9月生。家贫，父早丧，小学毕业即辍学，后考入官费师范，1936年考入国立河南大学文史系。1933年开始发表文艺作品，加入“北方左联”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曾先后任《大刚报》、洛阳《阵中日报》、南阳《前锋报》、开封《中国时报》编辑、战地记者、副刊编辑、主笔等职。主编《山雨》、《烽火》、《春蛰》、《春潮》等副刊。为追求真理，坚持进步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建专政，曾先后两次被捕入狱。1948年8月，携家进入豫西解放区。解放后曾任《开封日报》、《河南日报》副刊主编，并任河南文联副主席，主编《河南文艺》及《翻身文艺》。1953年调中南文联及中南作协任第一副主席，主持《长江文艺》编务。1957年整风中被错划为“右派”。1960年摘掉“右派”帽子后调到武汉市文联从事创作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彻底平反，1978年任武汉文联副主席、武汉市作协主席，主编《芳草》。1988年离休。出版作品有《土的故事》（小说）《水终必到海》（散文）、《难意的会见》（报告文学）、《豫灾剪影》（通讯报告）、《文艺短论集》（评论）等。



作者1936年与夫人宋映雪在河南汝南南郊留影



作者1952年在朝鲜前线



作者1956年于武汉（苏联《勇敢》一书的女作家凯琳斯卡娅摄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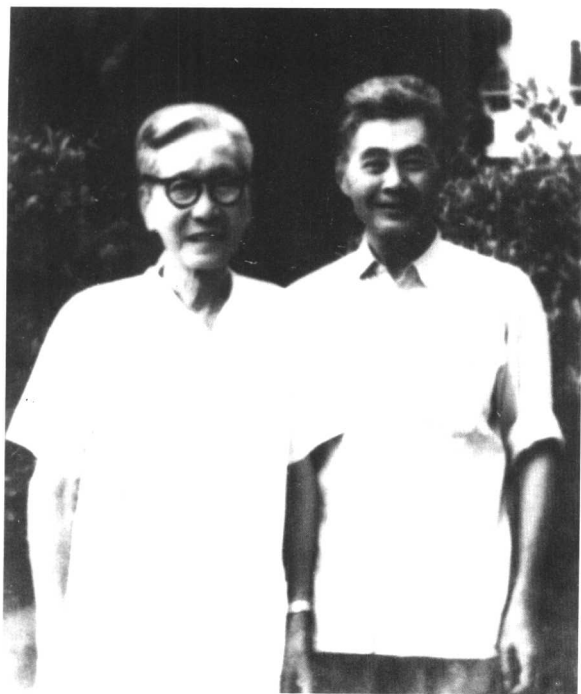


1952年春于朝鲜前线
自左至右：作者、逯斐子
(女)、巴金、茵子
(女) 黄谷柳

1952年在朝鲜战场某军庆功会上与作家魏巍及特等英模合影
自左至右：刘光子、王永章、
魏巍、郭恩志、作者、李满



1952年在朝鲜战
场与志愿军某部
首长合影



1979年作者与水生物
专家伍献文合影



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为纪念抗
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赠给抗日
战争时期老作家的纪念品

一个跋涉者的足迹

(代 序)

(一)

我开始拿起笔,写一点文艺作品作,是三十年代初期。写的当时,只是心里有许多话说不行,便写了下来,不计工拙,更没想过要做什么作家;待发表了,就觉得责任已了,也没有考虑过什么出书。

当时,各种文学样式都涉猎一点,而在各种样式中,我更喜欢使用的形式是报告文学和散文,因为他方便,无拘无束,可以及时反映急剧变化的生活,也便于抒写自己内心的情感。

我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散文,便是这个文集中散文卷的第一篇——《柿园》。

说到它,就得先谈谈我的家庭,我的童年。

我的故乡,在河南西部的一个偏远的农村,祖祖辈辈,都

是以农业为生。因为地处半山区,丘陵起伏,十年九旱。光绪三年、民国九年两次大旱灾,村中人饿死大半,人们一提起来便心有余悸。我的祖父是一个很坚毅而有远见的农民,为了对付旱灾,便种了五六亩柿树。我有记忆的时候,这些柿树已经成为大树了。柿树的特点是不怕旱,越早结得越多越稠,有这一张王牌,大旱灾的侵袭便不那么可怕了。柿树是春天开花,夏天结果,秋天果实成熟,冬天才把成熟的柿子翻晒成柿饼。因之,一年四季,它都是我们希望的中心,凝结着我们一家人的欢乐和忧愁。童年时代,我们用麦条穿柿花,挎着篮子上树采“红灯笼”,在枝叶茂盛的树上玩“爬树猴”……然而,这是过去的事,到了我执笔为文的时候,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,农村经济迅速破产,柿树园也失去了昔日的欢乐,只剩下日益贫困的忧愁。《柿园》就是在这种严酷的现实下写成的。

这一时期,我正在开封师范读书。当时从大的时代背景说,正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危机关头。东北四省沦陷,日军节节进迫,华北岌岌可危,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抗日,而且继续围攻工农红军,残酷镇压革命运动。我所在的开封师范学校当局,采取的便完全是法西斯统治。进步的、主张抗日的同学,被公开逮捕,稍有嫌疑的同学,也被监视、追踪,学期终了,以

“操行不及格”为由无声斥退。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环境中，每一个爱国青年，都郁结着一腔愤怒之火。我这时候便完全抛弃了功课，一心沉浸在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中，从中找到启示和慰藉，我特别喜欢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和中国“五四”以后的新文艺。我们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，也自动组织起来，在地方报纸上辟专栏，办副刊，学习创作。收在这个集子里的除《柿园》外，象《吐诉》、《在边缘上》、《悼椰林》、《桌上哥尔夫》、《钠》等，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。

《桌上哥尔夫》、《钠》，都是藉物言志的。当时我认为桌上哥尔夫球台，就是现存社会的缩影，而在球台上碰来碰去的那个球，就是青年命运的象征。在《桌上哥尔夫》中，我赞扬了“走一生，碰一生，永不得分”的球；在《钠》中，我也赞扬了不在水中分解，而是在水中“嘶叫着，燃烧着”的钠。这两篇的思想与《吐诉》、《在边缘上》是一致的：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极其憎恨，不愿作现存社会制度的维护者，把向上爬看作可耻的行径，准备为追求真理，走一生坎坷艰难的路。但人生的路应该怎样走，真理究竟在哪里在当时还是十分迷茫的。

一九三五年，我从开封师范毕业。当时师范生有一项待遇，即到江南教育发达的地区参观学习，同学们趁此机会，饱览了江南的名胜。但此行给我印象最深的，却是读到了鲁迅

先生的杂文。我一到上海,便跑到北新书局,买了一大包鲁迅的著作:《二心集》、《三闲集》、《南腔北调集》,贪婪地读着,有时连名胜古迹也忘记了游览。记得从上海到杭州的旅途中,因为是夜车,全车厢的旅客都入睡了,车厢内寂静无声,灯火明如白昼,我一人沉浸在鲁迅的那些战斗杂文中,读到精彩之处,不自禁独自笑出声来。我极佩服鲁迅先生那一支饱和着思想而又犀利幽默的笔,自此以后,鲁迅先生的杂文便成为我用笔进行战斗的一盏指路灯。

(二)

一九三五年,国家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。一方面,日军步步进逼,连北京、天津也行将不保,而国民党反动派仍步步退让,继续执行“先安内而后攘外”的卖国投降政策;另一方面,共产党的停止内战、联合抗日救国纲领深入人心,抗日的呼声响彻云霄。地火的运动是不可遏止的,霹雳一声,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爆发了。北平的学生,首先发难,河南的学生也起而响应,当时我正在河南大学读书,也投身到这一洪流当中。河南反动政府头子刘峙,被爱国学生运动吓慌了手脚,初则严密封锁学校,不准学生上街,继而派大批军警,荷枪实弹,

阻止学生向群众宣传。面对这种形势,我的笔再也无法缄默,连续写了《大砍刀与救火龙头》、《不要净街游行》、《嘉奖》等文章,在河南《民国日报》的《中原》副刊上发表。

这一时期,我的视野扩大了,题材领域放宽了,对于有利于抗战的新文化运动,我都尽力参加。为了响应大众文化运动,我写了《文字和话不要分开》、《汉字不妨尽量通俗》,为了宣传文艺在抗战中的职能,也曾撰文和当时当地的“第三种人”作斗争,和黄震遐派的“民族文学”鼓吹者作斗争。有些文章已经散失,无法找到了。

当时的《大公报》《文艺》是肖乾主编的,他出身贫苦,思想解放,对扶植青年作家,特别重视,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之下,我经常在《文艺》上发表作品。《在边缘上》、《活笑话》、《眼》、《寂寞的胜利》等作品都是在他主编的《文艺》上发表的,在长期投稿和通讯中,我们成为朋友。

左翼作家联盟,尽管在当时受着极其残酷的压迫,然而在青年心目中威信很高,虽然出现“国防文学”和“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”两个口号之争,但那两个口号都积极主张抗日,目标是一致的。然而此时此刻却出现了文艺与抗战无关论,认为文艺一接触政治,便会产生公式化、概念化。当时在《大公报》《文艺》上发表的《反差不多运动》,便是这一主张的突出代

表。他的文章,打的旗帜是“反差不多”,实际上矛头是指向当时的抗日文学运动。文章责怪抗战文学是“为了追逐‘时代’这一空洞的名词,三十万青年腐烂在泥土里”,指责追求革命但艺术功力还不够的青年“不是用大脑思考问题而是用脊椎骨反映问题”,他对歌颂光明,揭露黑暗但还比较粗糙的作品,抱着厌恶诅咒的情绪,说“这些作品名为歌颂光明,诅咒黑暗,不知道它本身就是黑暗。”这篇化名炯之的文章,实际上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沈从文先生所写。我当时虽自知人微言轻,无力和文坛名家相抗衡,但对于他这些奇谈怪论,实在无法接受,于是化名肖云,写了《反差不多运动的根值数》一文,对他进行反驳。炯之的文章,和亿万青年的看法想法是相悖的,发表后许多人纷纷反对,于是这场“反差不多运动”便很快偃旗息鼓了。今天在这个集子中选入此文,一是纪念抗日前夕文艺界的一场被人遗忘的斗争,同时,对于今天有些青年朋友,由于对“极左”政治的反感,走向另一极端,认为文艺离政治越远越好,艺术绝对自由,绝对独立,也许多多少少有些借鉴作用。

正在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,文艺战线熄灭了一盏指路明灯,1935年10月19日,鲁迅先生病逝了。他给千万青年带来的悲恸是无法言喻的。

我对先生的爱戴和景仰是发自内心的，当时就写了《悼鲁迅先生》一文，在黎烈文主编的《中流》上发表。事隔五十多年，重读此文，仍感到一切仿佛如昨。鲁迅先生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。

这一年，我在开封师范的两位知交魏伯（原名王经川）和柳林（原名王焰）在北平创办了以宣传抗日为中心内容的《泡沫》、《浪花》，我经常和他们写信联系，并写文章给以支持，他们也经常写稿，支持河南《民国日报》的《中原》。他们办的《泡沫》、《浪花》是“北方左联”的机关刊物。一度曾在洛阳师范教过我语文的作家孙席珍先生，也是“北方左联”的领导人之一，我们也经常写信，在他们的影响介绍下，我参加了“北方左联”，成为集体中的一员，再也不是一名散兵游勇了。

（三）

芦沟桥的炮声，全国抗战爆发了。我离开了河南大学，走向抗日前线。我不会拿枪，便做了一名新闻记者。一开始参加在郑州创刊的《大刚报》，在豫北前线采写战地通讯。但当时指挥京汉路前线的是“长跑将军”刘峙，他败退的步伐比我们的笔尖还快得多，许多战地报道还没来得及发表，那些地

方就沦陷了，致使辛辛苦苦的战地采访成为无效劳动。

当时抗战虽已爆发，但“抗日必亡”论仍十分嚣张，陶希圣在上海《大公报》上曾发表一篇题为《论国际新均势》一文，主要论点是论国际各列强之间，是一片和局，如中国单独抗战，必然失败。当时陶希圣是有名的学者，又是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部长，影响极为恶劣。我们编辑部一群青年读后十分气愤，公推我写了《抗战不同算命》一文予以驳斥，主要论点说明敌人对我们已白刃加颈，只有全国团结一致，坚决和敌人血战到底，才能死中求生。如果像巫师一样，占卜算命，只能自取灭亡。这篇文章，立刻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，和创办的《大刚报》威信得到提高，销路大增。事隔不久，这位陶希圣先生果然跟着汪精卫做了背叛祖国的汉奸。可惜这篇文章经已经找不到了。

一九三八年春，我们参加了徐州大会战。当时“台儿庄大捷”成为全国新闻界报道的中心，全国著名记者云集徐州。我奉《大刚报》的派遣也到徐州做战地记者，但刚刚写了几篇通讯，日本兵便从西边迂回包抄切断陇海路，向南切断了津浦路，把我们困在包围圈中，成为釜底游鱼。正在走投无路之时，幸好碰上了范长江同志，随他找到了突围大军。经过八个昼夜连续不断的徒步跋涉，才钻出了敌人设下的死亡圈。及

至绕道回郑州，黄河已被扒开，开封已经沦陷，郑州岌岌可危。此时《大刚报》也已南迁；赶到信阳，报社还没走，但老板却说：“报社无法维持，我们也要疏散人员”，把我解聘了。茫茫大地，无处存身，哪里也找不到为抗战效力的机会。

当时“保卫大武汉”的口号喊得正响，我便和爱人宋映雪同千万爱国知识青年一起逃奔武汉。我们和于黑丁、曾克、臧克家、碧野、田涛等一群，先后住在武昌海马巷一家既肮脏又破旧的小客棧里，谁也没有职业，每天除跑警报外，便是为如何吃饱肚子发愁。

这时候，各人都在自找出路。我们感到跟着人流往大后方跑没有前途，决定奔赴延安。由评论家王淑明介绍，给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介绍信。马上就要远走高飞了，我和爱人又牵挂起远在家乡生活无依的父母，又决定回去替他们安排一下生活后再走。这样又回到河南南阳。但是却没料到，我们刚到南阳，武汉广州很快就沦陷了，与此同时，胡宗南也封锁了大西北的通道，去延安的计划便成为泡影。

一九三九年秋，经碧野介绍，到洛阳《阵中日报》工作。那个报纸，群众称之为“半边报”。所谓“半边报”，即副刊还是好的，而新闻却是伪“中央社”一家垄断的。为了打破“中央社”独家对新闻的垄断，我受范长江同志的委托，成立了国际新闻

社洛阳通讯站,把解放区的稿子转向桂林总社,然后向全国各报分发;我们用编辑部的假“护照”把从重庆来的“自己人”送到八路军、新四军根据地;我们组织青年记者学会,团结进步青年……总之,我们尽力之所及,想在黑暗中偷运进一点火光。然而,在国民党鹰犬遍布的险恶环境中,我们的活动很快地引起了敌人的注意。一九四〇年冬我被三青团头子王采芹逮捕,关入洛阳的“劳动营”,碧野事先已只身随苏联顾问南行,奔向五战区。经国新社多方营救,我被保释出狱。那时国统区已是皖南事变后的反共高潮,《阵中日报》整个改组,所有进步的战友,一律被解职,我也被报社开除,成为“共党嫌疑分子”。抗日无功,爱国有罪,这就是当时文艺工作者的命运。

一九四一年,应老友臧克家、碧野、田涛等人之约,到河南漯河“三一出版社”,办了一个文学刊物《大地文丛》。《两种傻子》、《未完成的画像》,就是那一段生活的脚印。但在那里只有一个月,由于战局吃紧,朋友们便又象飞蓬般四散了。

一九四二年间河南发生空前的大旱灾,农民活活饿死三百多万,国民党政府不仅见死不救,反而加重剥削,并严禁各报刊透露灾情。《大公报》一个记者过境,写了篇通讯,报社据此写了《看重庆念中原》的社论,立刻被罚停刊三天。在这样的情势下,亿万无告的农民,只能大批默默地死亡。这时,南